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研究丛刊

走出区域研究
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

Beyond Area Studies
Selected Western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董 玥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研究丛刊

走出区域研究
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

Beyond Area Studies
Selected Western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董 玥 主编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 书
www.lib.ahu.edu.c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董玥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
(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丛刊)
ISBN 978-7-5097-4596-0

Ⅰ.①走… Ⅱ.①董… Ⅲ.①中国历史-近现代-
文集 Ⅳ.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762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丛刊
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

主　　编／董　玥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责任编辑／宋　超　邢丽雅
电子信箱／jxd@ssap.cn　　责任校对／季武西　胡锦华
项目统筹／徐思彦　　责任印制／岳　阳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7.75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368 千字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4596-0
定　　价／7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导　言 …… 董　玥　/ 1

一　世界·区域·国家

从东亚看民族国家的全球和区域构建 …… 杜赞奇　/ 31
一个女子眼中的海外游历：本土和全球视野中的
　单士厘《癸卯旅行记》 …… 魏爱莲　/ 62
创造亚洲：20 世纪初世界中的中国 …… 柯瑞佳　/ 103
东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 …… 卜正民　/ 137

二　革命作为历史变化形式

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 …… 周锡瑞　/ 181
找回中国革命 …… 裴宜理　/ 214
被误解的革命：1923—1926 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家
　与社会 …… 费约翰　/ 234

三　城市与日常生活史

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权威结构分析 …… 叶文心 / 265
从茶园到剧场：作为社会文本的20世纪早期
中国戏园 …… 葛以嘉 / 291

四　社会与历史之延续

放大民族分类：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及其民国时期
分类学思想根基 …… 墨磊宁 / 331
地方干部面对超自然：中国的神水政治，
1949—1966 …… 史蒂夫·史密斯 / 366
马尔萨斯主义论述之修正：关于明清时期
人口演变的比较研究 …… 雷伟立　王国斌 / 39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导　言

董　玥

这部文集里收录的是12篇过去20年里发表在重要的英语出版物上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则包括了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史。这部文集的作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从1960年代到20世纪末，跨度达半个世纪，他们在政治与学术关注上的不同因而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这一领域在这50年里的一些重要变化。选取这些篇章，目的既在于尽量全面地展现西方近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关注的一些新的问题，也在于希望能够引起对有些被忽略的问题的再度重视。在选择这些篇章的过程中，我与领域中诸多同行进行了讨论。这些选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领域中的一些共识。

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为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自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学术传统以及历史经验之不同的影响。人们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选择从来不是随机的，而总是在某个分析框架下做出的；这些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待。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因而有其特定的出发点及关注点，这是造成它与中国本土研究有所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了解国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应等同于在论题上的复制，中国学术界保持其独特的定义论题上的主动对于维护学术界的健康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因此，不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具体观点上，本文集的意图都不在于将这些文章作为简单

模仿的典范，而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进一步了解并思考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得失的一个机会。

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过去所做的反思，史学总是与整个社会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历史不可避免地被随时而变的思想结构、分析框架和现实关注不断塑造成新的知识，而这也正是这门学科的活力和现实关联性所在。换言之，史学变化的原因既有学科内部的，但也常常有学术外部的。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界明显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简要言之，包括中国本身的状况、世界政治格局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方思想和史学界自身的潮流。自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二战后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成为一个逐渐扩展的领域以来，其发展履迹从来都带了这些方面明显的烙印，而这一领域中突破性的发展通常是这几方面撞击的结果：在世界的不断变化中理解中国；坚持质疑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社会与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否可以或者如何用来研究中国；持续反思新的学术发展与前代的关系。这些努力中既有成功，也有局限，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不断的尝试是产生新知识的机制，也给予了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其特点。在这一方面，西方的研究或可为攻玉之石，有可以汲取之处。

西方关于中国的系统的知识生产开始于传教士和人文学者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和他们对现实中国的观察。前者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倾向于认同皇朝、精英、经典的记载；同时，他们在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中则描画出一幅落后、愚昧的图景，与当时世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白种人的负担”和“文明”话语同出一辙。这样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反映出在历史与当前、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分裂。中国被看作“逝去的文明”，其价值不过是圆明园与故宫中可以劫掠出卖或展示的古董；而现实的中国，其价值不过是其自然资源和其巨大的人口所暗示的市场潜能。

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在二战之后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

美国取代了欧洲，成为这种生产的中心。借冷战中的“区域研究”之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美国得到很大发展。在这个发展之初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区域研究的支持者认为应当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理解中国，因而强调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另一种态度是将中国放入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来看其变化发展的模式：如果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遵循一定的普世性的科学模式，那么历史文化差异对于未来的发展便没有意义——而这也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的取向。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分为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类；“现代性”则代表了与传统社会的彻底决裂——它要求人们将传统当作枷锁来彻底抛弃，以理性做出对未来的选择。这种理论强调传统社会之所以停顿是因为其文化和内部机制所致，而当被加以恰当的刺激与帮助，传统社会还是能够以西方国家同样的方式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韦伯的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无所不见，被借用来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他自己强调他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发的资本主义；趋同理论也在众多研究中或明或暗地出现。现代化理论并非不承认传统的存在，而是将传统看作经济发展的障碍，认为对传统的破毁及其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变化是人类必须付出的代价。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受到这个大背景很大的影响，比如将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社会看作停滞不变的，因而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变化都是西方冲击的结果。这一时期的研究留下的一大争议是，近代中国的变化到底是内因还是外因引起的？这背后的政治问题自然是对当时中国的评价和对未来中国的预想：中国如果不再遵循着西方的路径而发展，这对人类历史会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还是偏离正途？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强调的不单是中国的落后，而尤其是其内部变化能力的丧失。如果遵循这样的逻辑，中国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当然就只能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而其历史遗产所具有的只能是负面的阻碍作用。在这种现代化的模式中，中国常常被与日本加以比较：日本是现代化成功的榜样，而中国是

失败的例子。日本的成功被认为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积极吸收外来因素的结果，而中国则被认为是被传统束缚住的、故步自封的典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对变化的外因或内因的不同强调这一冲突对以后几十年里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影响深远：西方的影响力与中国内部的动因之交错，西方的理论模式与中国的历史现实之平衡，成为很多具体尝试后面隐含的中心关注。以西方作为参考系，思考的倾向便是与西方的相同和不同。相同自然是以西方的概念和历史经验为主线，不同则是对照西方时显现的缺失，背后的问题都是中国是否会要或如何走上西方的道路。

虽然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发展早期与区域研究关联密切，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关联是一成不变的，那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关联很快就在领域内部受到挑战。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所进行的努力正是走出区域研究。首先，越战带来的政治反思给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60年代进入领域的一代年轻学者不满于将中国历史归于“冲击—反应”的模式，认为这样的视角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因为在这个逻辑中，一个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由自己的文化决定的，成败责任全在自己，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并不相干。甚至更进一步，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中国开辟了现代化的可能性。新一代学者开始从中国内部寻找变化的根基，希冀“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些学者的著作在1970—1980年代开始出版，为整个领域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气象。他们仍然关注大规模的变化模式，但其关注点不再仅仅是上层政治机构与决策、军事行动，以及外交成败。综观这一时期的成就，1980年代是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与突破，那个时期产生的一些著作至今仍然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国策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开放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去中国查资料，看档案，做田野调查，这使得社会史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批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学者，带着他们特定的政治关怀，加之受到西方社会史领域新发展的影响，发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史，在这一领域里展示了自己作为成熟学者的风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尝试——比如魏斐德和周锡瑞等人的工作——并不是只考虑内因，后来柯文将之总结为“中国中心的历史”不甚妥当。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各种方式与世界交往，而在19世纪以后更是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在全球视野下把握中国问题，便不可能对近现代中国有真正的理解。“中国中心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甚至会误导视线。近现代的中国，不论是在历史实践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的视角当然也应当是世界视角。

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批评来自1990年代建立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上的对“区域研究”的反思。这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常常沦为地方史，越做越小，因为不从根本上检视殖民主义的角色而变成为殖民主义开脱责任。这相当具有讽刺意味：越战后因反帝国主义而出现的研究又被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为替殖民主义开脱。这些对区域研究的另一个批评集中在政治和机构方面，认为它服务于美国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些批评过快地道德化、政治化，真正的知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如何评价区域研究对语言和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视？这种重视本身是否一定与考察殖民主义的运作与影响相冲突？

新社会史在西方史学界1960—197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学派为中国学者带来了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思想方式上的启示。年鉴学派史学家抛弃了线性的或方向性的时间概念，打破了对“进步”和西方优越的信念。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认为，“从兰克到马克思到韦伯所有的历史学家，以及后来美国的倾向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都将历史看作从过去到未来的跨越一个一维时间度的运动。年鉴学派的历史

学家通过强调时间的相对性和多重性对这种概念做出了根本性的修正。"① 如果此前对全世界历史的理解建立在它们都是展开在一个同一的历史时间和历史过程这个假设之上，年鉴学派使我们有可能在每一个文明内部或不同的文明之间探索一种共存的复性的时间，或者异质的时间性。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史学者来说可能是双重性的解放：西方不再提供和控制我们由之理解中国历史的框架；现代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中心，学者关注的重心从政治机构和精英思想转移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的行为与经历，以前被历史学忽略的"小人物"或普通人在历史激变中的经历成为大量史学研究的主题；少数族裔、妇女、劳工、性别、家庭史应运而生，史学的研究对象大为扩展，而这种扩展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的政治关怀相当一致。社会史在研究新的人群的同时，也提出关于这些人群的新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各种以前不被认作史料的资料对社会史学家来说成了财富。因而，随着新的研究对象而来的是对新的史料及其解读方法的探寻。在社会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们从社会科学那里借取方法，而这些方法也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理论和认识论的新视角。

中国发生巨变的30年也恰好是史学界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化的时段，最重要的表现是继社会史之后文化史的出现与发展。这绝非二者之间的巧合，而是因为它们同属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停留于在结构层次上看普通人的历史：他们希望能够理解普通人生活的文化意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正如整个西方史学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无数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历史中的文化）让这个新的发展非常彰显，这个转向也包括对历史研究采用文化的视角（从文化看历史）。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

① 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Middleto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向印刷文化、视觉文化、城市文化、大众文化等等，以前通常会从政治和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问题现在常常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电影、电视节目、戏剧、旅游、饮食、时装等日常生活实践都已经成为大学里研究和教学中可以被接受的题目。而文化史则与“语言学转向”和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联系在一起，部分表现为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重视。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二者一个共同的动机是对“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框架提出质疑，并找到不同的思路去更好地理解中国之现代性，在这个努力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强调中国人自己在塑造历史中的能动性。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性问题，这个焦点的选择的动机一部分是抵制中国的现代性是派生的这个概念，特别是“过渡期”这种叙述，因为这种叙述“制造了那个越来越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幻象，就是如果给予他们所有合适的条件，加尔各答就会变成伦敦，西孟加拉邦的穷人和富人都会‘理解’如何正确地区分私与公的原则”。[①] 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史学家试图避免把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说的“作为概念的欧洲”当作自然而然的“沉默的参考系”，他们拒绝“先是欧洲，然后是其他各处”的目的论视角。例如，近年来对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的研究探寻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独特性，以图打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建立一种对全球现代性的同步性的理解。

在这个语境中，文化便成了学者寻找抵抗、主体性、创造力，或简单地说，不同的做法的地方。他们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宽泛流动性的定义，而这种定义明显地受到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史学界对文化的两种理解的影响，一个是1960—1970年代的将文化作为象征和意义体系，另一个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

---

① Sudipta Kaviraj, cited in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9.

将文化作为实践。对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精英文化行为，比如精品文学、美术，或者社会学意义上对文化定义，即抽象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彼得·博克（Peter Burke）指出，“文化已经被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路线重新定义了，它包含着人们‘传承下来的古物、物品、技术过程、思想、习惯，以及价值’；或者沿着戈尔茨的路线，文化是‘社会行动的象征性维度’……日常生活或‘日常文化’在这个角度中是关键性的，以及布迪厄所讲的‘实践的理论’和朱瑞·劳特曼（Jury Lotman）所讲的‘日常行为的诗学’。”① 与社会科学对于无名无姓的结构和过程的重视不同，文化史学者试图通过给予社会史一个人性的面孔去纠正它的弱点，给予他们所研究的人们以主体性和个人性。

这种转向是对1978年以后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应，也是苏东解体后世界学术界关心的新问题在中国研究中的表现。在为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兴奋的同时，很多西方学者也希望看到中国走一条与西方不完全相同的道路，能够避免西方社会所经历的一些困境，期待中国的崛起也能为世界提供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个初衷常常没有在具体的研究项目中得到体现，文化史向后现代的转向带来了一些很大的问题。首先，文化史的人类学化主要依赖于还原与实证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考察单独的文化实践，然后这些小小的碎片放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但是这种“解释”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而且这样的文化史会变得孤立，变成另一个小节的历史，从大的历史中散落开来，没有任何的中心。20年前，琳·汉特（Lynn Hunt）检视欧洲和美国文化史领域时指出，这样的历史倾向于研究细微（trivial）的事物，甚至倾向于寻找猎奇性的东西。她警告我们要提防这样的危险：我们会变成“发展一种仅仅靠

---

①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94.

研究的题目来定义的文化史。就像社会史有时候从一个群体移到另一个群体（工人、妇女、儿童、少数民族、老年人、青年人）而不发展任何连贯性或题目之间的互动一样，靠题目来定义的文化史也同样会退化成为对新的文化实践的寻找和描述”。[①] 20 年后，这个危险看来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并没有过去，“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实证性的和描述性的方法没有超越对文化实践的叙述，因而，文化的意义仍然超越这种研究之上。”[②] 而且，对中国的具体“文化知识”的积累常常并没有为跨文化理解开辟任何新路。

第二，正如威廉·苏尔（William Sewell）所讲，在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影响下的文化史学家，偏向选择富于象征意义的史料与题目，集中于分析这些史料与问题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避免明确指出文本之外的任何现实的研究方式，使得文化史学家无法提出，更无法解答新社会史的一些中心问题，比如，财富的社会分配，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土地所有模式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等等。而且，文化史事实上并没有解决社会下层的人民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问题。对文本史料的偏爱，使得那些没有留下文本的人仍然处于历史之外。斯皮瓦克甚至指出，我们无法让噤声的底层（subalterns）讲话。在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却不仅仅放弃了对这样一个现实的结构的理解，甚至还否认这种现实的本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与问题。在苏尔看来，这种盲点的来源是文化史本身就是后福特时代生产机制的一部分。[③]

---

① Lynn Hunt, “Introduction,”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9.

② K. N. Panikkar, “Culture as a Site of Struggle,”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4, no. 7 (February 14, 2009): 38.

③ William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第三，文化史确实使得历史学家做了更多的自我反省，并增强了他们对文本和史料的敏感和批判性，而这更加凸显了跨文化和跨社会知识生产中几乎不可避免的偏见的问题。我们似乎陷入了萨义德给我们留下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尽管“东方主义”的概念成功地揭示了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建构和解释中弥漫的帝国主义模式，但是他的理论却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方式，如何能够仍然去理解一个文化，而同时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社会科学的模式诚然带有它们生产于其中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对这些模式的批评却同样让我们寸步难行。我们仍然面临着两个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史学家的问题：在一个极端，是以一个文化的价值去衡量另一个文化；在另一个极端，是在不同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的差别面前止步不前。可以说，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次上都还没有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通过“区域研究”而进入学术界，又通过内部的挑战和论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自觉地“走出区域研究”，对区域研究所带来的有意无意的惯性的批评今天仍然在持续。与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样，他们的努力之成功程度可以讨论，但是西方学术界这种自觉的自我批判的传统确实值得思量。

在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对民国史的研究可以说是1980年代以来进展最大的领域之一。这之前民国史仍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题目，而那时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常常集中于国共之争上。社会史与文化史在中国历史领域的发展为学者重新观照民国史提供了新的空间。如果说将政治史作为研究的中心容易使人们强调历史的断裂，那么社会史和文化史则倾向于揭示断裂下面的延续。这本文集收入了几篇关注点超出民国的政治时段划分的文章，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问题，有些是直接延续了晚清时期的发展，有些则与晚晴时期产生的思想有对话和回应的关系，比如人口的长时段模式，民族主义概念的变迁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所面对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也同样无法与民国时

期划出明确的界限，比如民族识别的知识源流，又比如神水崇拜的现象。包括这些文章意在强调虽然在政治上民国时期或可以划为一个单独的时段，但是在历史的诸多方面，这个时期与其之前与之后的联系和它们之间的断裂同样重要。这部文集里的12篇文章因而涵盖了从清末到1950年代的一百年，中心时段是20世纪前半期，重点在于过去20年里进展或观点变化比较大的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世界、区域、民族、革命以及日常。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与中国国内略有不同，一般包括了从鸦片战争到“文革”的一个多世纪，统称为现代中国史。①

一 世界、区域、国家

随着民族主义成为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对民族国家的反思亦成为1990年代以后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种反思不仅反映在关于中国内部历史的研究上，更反映在新的世界性视野中。本文集中的前四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几个这种新的世界性视野的例子，四位作者都认为“国族”不仅仅是任何一个民族内部的问题，而是在全球情境下的历史问题，而且区域和亚洲的概念在他们的分析中都具有根本性意义。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针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关键性的论点，他的诸多书籍和文章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他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对于将中国自然而然地当作民族国家进行研究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当我们把国家作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我们便放弃了甚至掩

① 因篇幅有限，很多具体的问题和研究成果无法一一讨论。叶文心教授著有《当代北美学术界的近代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前瞻》，收入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第209-215页。同一文集中还有其他与近现代史相关的篇章可参阅。

盖了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之外的其他可能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叙述本身否认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可能性。他的研究目的不止在于发现新的历史，而且还在于探索一种新的方法，以寻找“被压迫的历史”。他最近的著作《主权与本真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审视伪满洲国所宣称的“本真”，对一个试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如何将“本真性”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资源加以辨析，从而展示出当我们不把民族国家当作观察的界限和框架时，我们反而能够更加看清楚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制度这个历史过程。本文集所选入的“从东亚看民族国家的全球和区域构建”，从另一个相关但略有不同的角度审视东亚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如何为后来东亚各国间的竞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区域性框架。作者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的认知与机构建造的过程，但是部分因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竞争和扩张天性的反应，民族国家经常被迫依赖于一个错认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叙述来定义自己的合理性。作者也强调国家的和非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它对于历史地理解民族主义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篇文章包含诸多近年来关于民族主义讨论中的基本性的共同认识，从全球和区域的流通与互动的角度研究民族主义，为我们理解在20世纪民族主义在这一区域的持久与强烈提供了一个思路和可能的解答。

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研究重点在中国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和东亚比较文学。虽然她的专业并不是历史，但是她跨学科的角度和比较的视野恰恰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钱单士厘随钱恂出访日本和欧洲时写下的笔记，在1980年代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一部分出版后，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是对这些日记的解读基本上停留在相对表面的层次上。如何从这些大家相对熟悉的文本中牵引出其微妙含义，这是魏爱莲这篇文章的过人之处。她将钱单士厘的笔记置于两个背景下加以分析：中国国内关于妇女地位的讨论和当时的国际背景。作者采用了一系列的比较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读钱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